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民族音乐具有重要地位。近日，省歌舞剧院副院长张音悦做客国学讲座，讲述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，带领大家领略民族音乐之美——

民族音乐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

■文/本报记者 许珂 图/本报记者 王翟

“还记得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26支骨笛吗？其已有8000—9000多年的历史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可演奏的乐器，现在仍能吹出4声、5声、6声和7声音阶。”一开场，张音悦就介绍了中国民族器乐。她告诉大家，“八音”称谓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即已形成，“八音” 其实就是我国古代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种制造乐器的材料。而《周礼·春宫》里面称的“五声”，指的就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音阶（即1 2 3 5 6），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。

张音悦介绍说，发音工具的长期使用，使人们逐渐掌握了发音的手段，审美听觉也得到了开发。所谓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；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。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音乐的内容和作用也随之扩大，美的因素逐渐增长，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。

张音悦

人类为了生命和种族的延续孕育了音乐

早在文字发明之前，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，人类在从事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孕育了音乐。

上古时期（远古—公元前221年），人们经常用音乐、诗歌、舞蹈为一体的“乐舞”来表示对自然、祖先以及图腾的崇拜，比较出名的有黄帝的《云门》、唐尧的《咸池》、舜帝的《萧韶》等。商代盛行求神问卜，并必伴乐舞，由此产生了专司乐舞的“巫”及“觋”。他们能歌善舞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舞蹈家，并促进了乐舞艺术的提高发展。

“《周礼注疏》中，提出了‘黄钟大吕’。黄钟是六种阳律的第一律，大吕是六种阴律的第一律，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、正大、高妙、和谐。”张音悦表示，秦朝统一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汉族民歌和部分原始社会歌谣。其中，《诗经》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，《楚辞》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。

到了中古时期（公元前255—公元589年），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，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，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——乐府，其任务主要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、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，进行演唱及演奏等。

相和歌、鼓吹乐是汉乐府最主要的音乐体裁，相和歌的原始形式是民间徒歌，以及由“一人唱三人和”（《宋书·乐志》）的但歌，它们经乐府整理，加上管弦乐器伴奏，就成了“丝竹更相和，执节者歌”的相和歌。相和大曲是相和歌较为发展的形式，它的结构主要包括“艳——曲和解——趋（乱）”三部分。

清商乐则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，实为乐府变体。公元4世纪，西晋灭亡，东晋建都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北方音乐文化也随之流入江南，并把汉、魏以来的相和歌、相和大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相结合，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与形式——“清商乐”。

隋唐时代，一些民歌中较好的曲调，经过文人精选加工，并用新词重新配曲的音乐，叫作“曲子”。曲子的结构形式有多样，一般以单遍的只曲为主，也有用两个单遍合成的双遍，称之为“双阕”等。在曲式上，曲子词大部分为“长短句”。

近古时期（公元960年—公元1840年），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，人们常用词调多达800多首，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、小曲，如《忆江南》《柳青娘》等；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，如《阳关引》《水调歌头》《调笑令》等；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，像《菩萨蛮》《苏慕遮》等。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，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“自度曲”。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，他作有自度曲《扬州慢》《杏花天影》等十四首，载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。

元代流行的散曲直接继承宋词音乐传统，同时又吸收了其他民间曲艺形式。它多根据宋元杂剧曲牌填配新词，但不同于表现曲折故事的杂剧，而是以清唱形式抒发个人情怀，通过对某种情景的描述表达作者的内心感触。

明清时期，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分。自娱性的民歌小曲、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、戏曲音乐，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。

近代（公元1840年—公元1919年），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——学堂乐歌，它是一种选曲填词的歌曲，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，后来也有用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的。学堂乐歌的倡导、推广者以沈心工、李叔同等启蒙音乐教育家为代表，代表作有《送别》等。

现代（公元1919年—1949年），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，国内出现了兴办各种新文化事业，建立各种“新式文艺学术社团”以及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风气。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“新音乐”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，使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、声乐、器乐、歌舞剧、流行音乐等实现了繁荣发展。

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

从礼乐兴邦再至六艺修身，从上古的先秦乐舞、唐宋的曲调词牌，再到现代民族音乐的蓬勃发展，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，民族音乐那绰约的风姿都有浓墨重彩的展示。

“‘礼乐’是周天子分封天下，诸侯国林立，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，武王之弟—周公旦制礼作乐。”张音悦告诉大家，礼乐制度分“礼”和“乐”两个部分。“礼”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，最终形成等级制度；“乐”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，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。

随着历史发展，音乐作为一种政治等级工具的作用逐步减弱，但作为学识、才能、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加深入人心，被全社会所认同和接受。儒家强调个人修养时，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艺，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。其中，“乐”即音乐、诗歌、舞蹈等。

自古以来，乐是儒家学说中个人修养所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为，音乐趋于更加自由，文以载道、歌以咏怀、乐以明心，音乐不仅陶冶心性，更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和志向的重要形式。

“回顾民族音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，其巨大和深远是不言而喻的。”张音悦表示，首先，在古代没有哪个国家会把“乐”提至“礼乐治国”这样的社会政治高度，也少有国家将其作为培养和衡量个人素质、修养的基本原则；其次，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史中，音乐滋养了无数的名士先贤，留下了难以尽数的传世精品。仅以唐宋时期为例，其时的文人大多精通音律，并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。这种全社会参与的音乐创作盛况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少见的。

可以说，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同时，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。

用典释义

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【讲话原文】

百闻不如一见。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、多看看，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，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，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，正所谓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。

——习近平《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》

【出处】

我家洗砚池头树，
朵朵花开淡墨痕。
不要人夸颜色好，
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——(元) 王冕《墨梅图题诗》

【解读】

这是元代诗人、画家王冕《墨梅图》上的一首自作题画诗。王冕一生淡泊名利，他爱梅、植梅又画梅、咏梅，在冰肌玉骨的梅花身上，寄托自己高洁傲岸的情怀。

第一句“我家洗砚池边树”，点出了梅花所在的位置。“洗砚池”，借用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”的典故，句中暗藏一“墨”字；因诗人与王羲之同姓，故称“我家”。第二句“朵朵花开淡墨痕”，王冕所绘墨梅，朵朵梅花均用淡墨点染而成，虽然不是浓笔重彩，却神清骨秀、疏淡清逸。

三、四两句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。墨梅并不以鲜艳的颜色吸引人、讨好人，博得人们的赞美，只愿散发缕缕清香，充溢在天地之间。诗人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性，巧妙地将画格、诗格、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外媒体宣告：“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，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。”并引用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 进一步阐明，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。

（杨立新）

品读经典

阅读杜甫诗的地理视角

阅读杜甫的诗歌，很容易注意到其空间感非常宽广，这与杜甫地理视野的阔大关系密切，而地理视野的阔大又源于其地理知识兴趣。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三：“州图领同谷。”其二十：“藏书闻禹穴，读记忆仇池。”《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》：“观图忆古人。”可见，杜甫到一个新地方是要查看图经地记的。这不是杜甫个人的知识偏好，而是古代读书人常有的知识要求。

杜甫一生迫于生计，四处奔走，又由于浓厚的地理知识兴趣，因此形成了阔大的地理视野。一部杜诗，仅写作地点就遍布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甘肃、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等八省市。实际足迹所至，未有存诗而仅在后期诗作忆及的还有山西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五省。按照曾大兴《文学地理学概论》归纳的中国境内11个文学区，除去古代文学很少涉及的东北文学区、闽台文学区外，杜甫足迹涉及秦陇文学区、三晋文学区、中原文学区、燕赵文学区、齐鲁文学区、巴蜀文学区、荆楚文学区、吴越文学区，仅有岭南文学区没有游历过。

从地理视角读杜诗，除了应关注杜甫地理视野的广阔，以及与此相关的地理知识的丰富，更应关注其对地理把握得如何，是浅表的、浮泛的，还是深入的、能把握地理个性的。就这点而言，杜甫最了不起之处在于总能在细致的观察、深入的体悟基础上，以极强的写实本领将地理的个性和精神加以表现。

从杜甫与地理的关系来阅读，可以看到当诗人向着陌生之地行走之时，他是在寻求栖居，寻求能安顿家小的“乐土”。到秦州，他把“满谷山云起，侵篱涧水悬”（《示侄佐》）的东柯谷想象成桃花源：“船人近相报，但恐失桃花。”转赴同谷，其基本意图正如《发秦州》所说：“无食问乐土，无衣思南州。”后来到成都经营浣花溪草堂就更不用说了。出川将到夔州时，有“农事闻人说，山光见鸟情”（《移居夔州作》）的诗句，可见是准备安顿下来的。“江上形容吾独老，天涯风俗自相亲”（《冬至》）就表达了这种心理。后来出峡到了湖南，准备赴郴州投靠远亲，也有“柴荆寄乐土”（《入衡州》）的话。杜甫蜀中以后诗多有日常生活情趣的内容，就是这种寻求栖居心理的表现。

但是，进一步的阅读会注意到后期杜甫的地理感知，有一对矛盾存在：在形迹上，诗人总是被抛掷在异乡的道路上，寻求栖居。而“因人作远游”（《秦州杂诗》其一）的话背后，透露的却是客游心态也即不愿“终老”的情感，所以在心理上，杜甫一直萦系故土，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（《秋兴八首》其一）便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意象形态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家风传承

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

——晚清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家风故事

在湖南湘阴县城西正街上，有一座四栋相连的宅院，是晚清时期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故居。因院内种有两株石榴树对着书斋，故名“面榴轩”。在这个灰瓦白墙的斑驳宅院中，有一副楹联悬挂于祠堂两侧的大门上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忠孝一生心”。这副楹联是郭嵩焘据其家训“世家先立本，道德与文章”而作。一百多年里，这副楹联所强调的“立德”“修身”等家风家训，对郭氏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儒商重义，乐善好施

郭嵩焘出生于一个儒商家庭。其曾祖父郭熊经营放贷、善于积累，是湘阴数得着的富商。由于郭熊读过书，曾为贡生，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，因此他虽善经商但并不唯利是图，而是乐善好施，使郭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。其祖父郭铨世传承祖业，在经营田地、盐业和钱庄的同时，常常仗义疏财、接济乡邻，使郭家成为了湘阴的望族。

曾考取秀才的郭铨世认为，家族要保持长久繁荣就必须要立规矩，并有所坚守。因此，他精心主持修建了本家祠堂“耕心堂”，定下了“世家先立本，道德与文章”的家训，并把这10个字写入族谱作为郭氏家族辈分的排行，时刻提醒后辈牢记先辈的期许和警训。“耕心”，即以心作田，耕耘不辍，意为加强自身的修养；“道德”，即思想品德，既包含齐家之伦理常情，也包括为人处世之道德操守；“文章”，意指学识学问，不仅包含诗词歌赋，更包括经世致用之学。

郭铨世的良苦用心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郭嵩焘的父母，在自觉传承家风家训的同时，十分注重培养子女。其父郭家彪精通医术，矜贫恤独，经常施药乡里，深受乡邻尊重。他作有一首《守愚诗》训示子女：“勿损人为智，勿私己为愉……欺心即欺天，造化焉可诬。人自习为巧，我自安为愚……守愚果愚哉？吾亦见真吾。”郭嵩焘之母亦遵循家训，特别注重对后代的教育。

守志明礼，诗书传家

儒商家庭背景以及祖辈忠孝节义、乐善好施的家风，对郭嵩焘的人生道路潜移默化地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。

郭嵩焘出生于商贾之家，但坚决反对为官有商贾之气。为官期间，郭嵩焘从不花心思为自家产业谋事。依常人眼光，郭嵩焘所担任的职务，不论是苏松粮道、两淮盐运使，还是广东巡抚，均是有丰厚“油水”的位置，尤其是任苏松粮道和两淮盐运使时，经手的钱动辄上万，但他除了分内的薪俸和养廉银之外，分文不取。

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，郭嵩焘任驻英公使期间，将实地考察心得详细记入日记《使西纪程》，把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，受到广泛关注，也使其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攻击。1879年，从欧洲黯然回国后，他去职还乡，虽赋闲在家，但不坠青云之志。他创办思贤讲舍，弘扬天地正气；探寻洋务新途，追逐强国梦想。他于书房题联：“无补清时，终老书斋原夙志；偶谈瀛海，重摊诗卷记前游。”这表明他退去官场，依然关注国事、不甘寂寞的心态。

守志明礼的郭嵩焘，对家族成员的要求十分严格。目睹赌博、吸鸦片之害，他赋闲在家时立下严规，凡赌博、吸鸦片者必须改姓。这一规矩得到了严格的执行。郭嵩焘去世后，其子郭立辉发现其妻染上了赌博恶习，虽非常痛心，但依然坚决执行家规，将其送回湘阴老家。郭嵩焘还非常注重培育后人的气节、督促后人读书。

君子之泽，五世不斩

岁月流转，风云变幻。在郭嵩焘的教诲下，郭氏子孙不忘祖训，勤修道德，专攻文章，在多个领域皆有所成。

郭嵩焘长子郭立篪，即曾国藩之女婿，在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期间，前往广州谨守父亲教导。郭嵩焘在抚署左侧，专为他辟一书室，并取名曰“食笋斋”。郭立篪在父亲督促下，学业精进，除科举考试一帆风顺外，还深受其父影响，游历山水，关注民生疾苦。郭嵩焘次子郭立辉继承了其父亲的养知书屋，从学于湖南士绅领袖、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，才识兼备，是小有成就的楚辞专家。

“君子之学首重治心。”受此家训影响，郭氏家族始终坚守道德良心和坚贞气节。1938年，日寇犯湘，长沙城遭到空袭，文夕大火把郭嵩焘在长沙营建的房屋全部烧毁，郭家举族避难湘阴老家。1939年农历五月初七，日寇突然空袭湘阴，县城被毁，郭氏族人多数掩埋在瓦砾之中，其他郭氏同宗不顾敌机轰炸，冒死营救。虽然在日寇侵略中历经磨难，但郭家依然坚贞不屈，仍竭力为挽救民族危亡尽绵薄之力。郭嵩焘的侄子郭金玉联合一些进步乡绅，在乡下设立了私塾，在敌骑纵横中采取敌来我散、敌去我聚的方式授业，传授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知识，着力培养救国图存的有识之士。

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》）

国学荐书

《漫画中国思想》

35岁那年，他结束了经营七年的卡通公司，只身到日本四年画先秦诸子百家漫画，庄子说、老子说、孔子说、孟子说等一系列国学漫画就此展开。1987年，这系列漫画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立刻造成轰动，也在中国大陆和日韩出版，全球有45个国家翻译出版这套《漫画中国思想》。三十年后，他又将当初没有画的诗经、易经、孝经、关尹子、鹖冠子等经典和诸子百家作品画完，使这一系列漫画更为完整。他是蔡志忠，四十多年来笔耕不缀，用简洁生动的线条，行云流水般的画笔融合对诸子百家、古典名著、唐诗宋词、佛经禅语的独到见解，将经典书籍白话化与漫画化，开启中国古典经典漫画的先河，风靡全世界。